

给基层公务员写公开信的李志友： 离开体制内才明白

64岁的“李志友”在网上突然“火了”，因为一个帖子。“李志友”是一个笔名。11月2日，这位老人打开自己的人民网强国论坛账号，带着几天来的思考，将那篇千余字的“给基层公务员一封信”发了出去。这位老人对“公务员抱怨工资待遇”的看法，开始引发关注。之后的媒体报道被冠以“老人劝基层公务员：你们俯下身就知自己是幸运儿”这个更为直白的标题，受到众多门户网站转载。一面是对这个工作的抱怨，一面却又是争先恐后地加入“考公”大军。李志友的帖子在11月24日的“公考”前，再次激发了人们对公务员的关注。11月15日，在天津市宁河县家中，李志友对本报记者说，自己写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话。

文/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

动机——

看不惯一些“诉苦”帖

李志友多年写作生涯中，从没有一篇作品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。11月14日，作为嘉宾的他参加了人民网的话题讨论，与网友全程互动，“还是支持我的人多一些。”

齐鲁晚报：当时发这个帖子是出于什么考虑？

李志友：主要是看到一些公务员的“诉苦”帖子，说基层公务员工资低、压力大，而领导收入高，心理不平衡，里面有一种明显的消极情绪。所以我就想以“过来人”的身份劝劝他们，只对事不对人。

齐鲁晚报：消极抱怨的根源在哪里？

李志友：公务员队伍确实存在“贫富不均”的现象，因为现在的分配制度不是按劳分配，而是按职务分配。一般来说，职务越高、地区越发达，薪酬就越高。职务大小、地区贫富不一造成公务员薪酬的差异。

但是，这不是抱怨的理由。因为跟大部分老百姓比，公务员职业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工资待遇，都是很好的。你不肯俯下身，而总是眼光朝上，跟领导比当然会心理不平衡。

齐鲁晚报：我们注意到，帖子发出后，网友们的评论大体分成了两派。

李志友：有赞的，也有拍砖的。肯定和支持我的人占大多数，其

中以普通网友居多，认为我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。反对我的人里面，当然有不少是公务员。其实也可以理解，每个人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。

公务员这个职业，本质上应该是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，跟其他职业比也不应该有什么优越感。目前在国内，官场存在腐败现象，政府机关“门难进，脸难看”，引起人民反感。而各种福利待遇既不公开又不透明，又引人联想。你的服务做不好，还抱怨工资、待遇，普通网友们不反对才怪。

分配不公是社会的通病，不光公务员队伍有。虽然一些基层公务员薪酬偏低，但是公考这座独木桥上仍然摩肩接踵，公务员这个耀眼的光环意味着稳定的收入和令人心动的社会地位。这种情况下你再抱怨，就不应该了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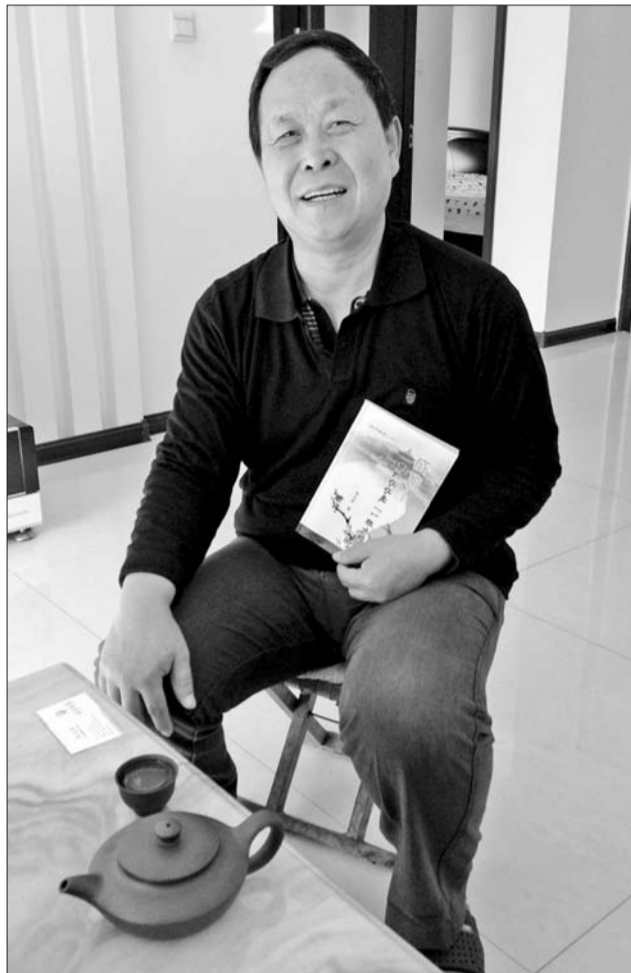
经历——

“体制内的经历让我看透不少事情”

以1993年为界，李志友的人生经历大致分为两个阶段。此前20多年，他在“体制内”一家大型国有农场办公室工作，最终升至办公室副主任。多年来的体制内生活让他“看透”了种种弊端，深感困惑与无解。借上世纪90年代初的“下海”经商大潮，“在同事们疑惑不解的目光中跳入商海”。

齐鲁晚报：农场的经历，对您上网发表一些针砭时弊的帖子有多大影响？

李志友：我上世纪70年代初进入唐山一家国有农场，在办公室做些文字和接待工作。现在的一些不好风气当时也有。比如，上级领导来视察工作，即使只来一个



李志友手里拿的是之前出版的作品。

人，也要一桌子的人陪，我们管这个叫“一个客人九个主人”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，上世纪90年代初朱镕基总理来考察的时候坚持要吃盒饭，让我很受触动。之后，我写了一篇叫做“不陪吃喝”的评论稿，发到了当时唐山一份行业内的报纸的头版上，引起了不少人关注。

但是，这种吃喝的风气仍然存在，而自己又无能为力，很困惑，很无奈。“体制内”的经历，让我“看透”了不少事情，在中国，大国企内的环境跟官场有不少类似的地方，所以我在帖子中说自己是“过来人”。

齐鲁晚报：下海以后还会关注一些社会现实？

李志友：对。1993年辞职后开始做塑料包装生意，但一没资金

二没背景，开始的两三年时间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一直到1996年，在天津的一个地方，东拼西凑买下了四间两层的门面商铺，生意才逐渐稳定下来。十几年虽然没有大富大贵，但过日子也算绰绰有余。

据我观察，这么多年，一些机关的风气并没有多少改变。比如，我家去年想买个房子，需要结婚证明，但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，家里的东西早就没了。我和老伴就去民政局开证明，不管怎么说，对方就是不给开。后来，我们又去居委会开了证明，办了其他一些手续，好不容易才办成结婚证明。

但结婚证要交100元钱，要收据，民政局的那个年轻人就说，结婚证就是收据。没办法，钱还得交。涉及到官场和公务员的一些

作风问题，我就会评论评论，前两年还出了书。

风气——

“拥权自肥”成为很多地方的问题

2005年后，学会上网的李志友逐渐在网上发表自己的作品。2008年注册了人民网论坛，李志友至今发表的“精华”帖已达100多篇。纵观李志友的帖子，几乎都是针对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场不正之风而发。

齐鲁晚报：如何评价官场上的一些不良风气？

李志友：就一些官场现状而言，“拥权自肥”问题成为很多地方存在的问题。公款消费屡禁不止，高薪养廉受到公众嘲讽，还有乱收费、乱罚款现象也十分普遍。广为社会诟病的“土地财政”更是明显的与民争利行为，因此造成的强拆强征恶性事件屡有发生。“与民争利”还是“与民谋利”？这是大是大非问题，是执政党为谁服务为谁谋利的试金石与分水岭。我写帖子，也只是说了普通百姓的心里话而已。

齐鲁晚报：官场上的不良习气与基层公务员抱怨的“工资待遇”问题，其间有什么联系？

李志友：很多的基层公务员对薪酬待遇不满，就与“风气不正”的大气候有关，与“上梁”的不良影响有关。现在的公务员们，多多少少都会掌握一部分公共权力，这就为那些心术不正的人搞“权力寻租”、搞些灰色收入创造了条件。而队伍中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人，就会对其他人造成影响，进而导致一些人的心理失衡乃至抱怨。

齐鲁晚报：2014年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又创新高。作为“过来人”，对于将来可能从事这项职业的人有什么忠告？

李志友：虽然都是十年寒窗，但进入政府的毕竟是少数，没听说过有多少公务员辞职去当工人、农民的。一句话，能考上公务员的，都是幸运儿，希望他们能够身在官场，志在为民，与百姓站在一边，多些为人民服务，少些消极抱怨。同时，更希望改变政府职能，改变公务员的终身制，改变贫富不公的社会现象。

扩建“八宝山”的时代烙印

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

对于很多官员来说，死后能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，不仅是一种荣耀，更多的还有政治象征。

北京市规划委此前宣布，八宝山革命公墓将扩建9450平方米的骨灰廊和1630平方米的管理用房。这座主管单位是处级、直接对口单位却是中组部的公墓，是一座安葬党和国家领导人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以及高级官员的规格建制最高的园林式公墓。鳞次栉比却又大小不一的墓碑和墓穴，也诉说着逝者生前不一样的级别和曾经的荣耀。

八宝山革命公墓新闻发言人董立波表示，公墓面临很大的压力，每年大约有1000份申请要将骨灰存入公墓，但空间是有限的。

骨灰堂外已经贴上了通告：“截至2013年9月底，革命公墓骨灰临时安放室已经存满，无法继续接收逝者骨灰存放，自2013年10月1日起，请家属自行安排骨灰存放。革命公墓北山骨灰廊工程预计

2014年6月完工，届时将按照逝者在革命公墓办理审批的时间顺序，电话通知申请家属办理选位。”

《八宝山革命公墓北院设计方案公示》已在北京市规划委网站公布，八宝山革命公墓北院将新建长达620米的骨灰廊，增加10020个骨灰龕位。

这次扩建计划，将略带神秘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带入公众视野。

1950年初，北京市政府报请政务院批准，正式修建“北京市革命公墓”。1970年，改名后的“八宝山革命公墓”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。

如今，任何人可以进出八宝山，无需门票和出示证件。但进出骨灰堂则有严格限制，一般除逝者家属外不得入内。这相比过去似乎算不上严格。

1950年，任弼时因病逝世后下葬在东部坡顶上，成为八宝山革命第一墓。以任弼时墓为基准平行于两侧的墓分别属于原政治局常委级的人物。任弼时墓建成后，曾有专门的警卫把守，直到1955

年，守卫的部队才撤出公墓。

对于还没有一座国家公墓的中国来说，八宝山革命公墓似乎是最好选择，因为这里的逝者同样拥有着荣耀。

八宝山革命公墓也根据干部级别，划分为三个墓区，甚至墓盖、石碑、月台的尺寸，也针对不同级别的逝者有不同的规定。

根据《革命公墓安葬暂行规则》，最低级别的墓穴地长12尺，宽6尺或长12尺，宽12尺。而安葬对革命有特殊功绩的，墓穴大小另行规定。目前，能够进入这座公墓的最低级别为局级。

除八宝山革命公墓外，还有烈士骨灰堂和革命公墓骨灰堂。骨灰堂分为一、二、三等室，逝者骨灰放置房间也有严格规定。骨灰堂位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央偏东的位置，分为11个骨灰室，中一室内有林伯渠、董必武、朱德、傅作义、李四光等人骨灰，其中中一室一座骨灰盒(101号)是朱德元帅的。

到后期，八宝山革命公墓用

地一度出现紧张。1958年，为了容纳更多的骨灰盒，八宝山革命公墓修建了一座室外骨灰墙。2006年，八宝山又新建了一座七层的骨灰墙，能够安放3400个骨灰盒。

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北院，记者注意到，在骨灰墙上装有过去世省部级领导和红军的骨灰盒。

历史学家章立凡的父亲章乃器曾任粮食部部长，章家获准将他的骨灰安放在骨灰室。章立凡曾透露，级别较低的官员的骨灰被安放在室外的骨灰墙。

因为用地和墓穴的紧张，级别较低的逝者并不能如愿地根据遗愿设定墓穴。享有较高级别、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逝者，则可根据逝者遗愿设计墓穴和墓碑。如聂荣臻元帅的骨灰撒在松柏之下，墓碑上刻有“喜松柏之气概，会四化之早成。”

八宝山革命公墓几乎和共和国同岁。从八宝山革命公墓也能窥探出这里些许的政治变化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毛泽东带头

在提倡火化的倡议书上签字，朱德、彭德怀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彭真、董必武、邓小平等先后签名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修建了革命公墓骨灰堂。

骨灰堂的骨灰摆放完全按照生前级别，很多革命家、领导人和妻子因此不能合葬，如陈毅的夫人张茜因级别不够，两人的骨灰不能共同进入中一室。

涉及高级领导人的建墓、迁建或一些重要变动，都需要中组部的批复。如贺龙元帅的家属将他的骨灰迁出，后迁至贺龙老家张家界，就是经过中组部批准通过的。

同样，骨灰迁出八宝山的还有彭德怀和陈赓夫妇的骨灰。

而在过去，要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则十分艰难，甚至无法想象，康生与谢富治的骨灰迁入与迁出正是例子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拨乱反正后，康生、谢富治被裁定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，两人的骨灰因此被迁出八宝山。